

苦 笑 录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陈 公 博

苦 笑 录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陈 公 博

(供内部参考)

苦 笑 录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陈 公 博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四月印刷

工本费 0.80 元

出版说明

一九三九年，陈公博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其时，汪精卫正筹组汉奸政权“南京政府”。随后，陈公博即参与“南京政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汪精卫死后，任“南京政府”代主席。

在《苦笑录》一书中，陈公博回忆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经历，记述国民党内部派系活动，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本书写成后，陈公博家属将原稿赠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封存，最近始由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本社现翻印供内部参考。

目 录

自 序	1
卷头的预白	5
第 一 章 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夕	9
第 二 章 廖仲恺先生的被刺	20
第 三 章 西山会议	26
第 四 章 三月二十之变	34
第 五 章 宁汉分裂	58
第 六 章 宁汉合作与特别委员会	80
第 七 章 广州驱李之役	106
第 八 章 《革命评论》时代	121
第 九 章 护党救国军	135
第 十 章 北平扩大会议	149
第十一章 广州非常会议	178
第十二章 “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	191
第十三章 长城古北口之战	199
第十四章 福建人民政府	208
第十五章 汪先生的被刺	214
第十六章 陈伯南先生下野	235
第十七章 西安事变	241

自序

这本书是纪载过去几件大事的实录，清楚了它的事件，同时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内容既这样简单，实在没有“序”之必要。但我想一想，为什么我名之为《苦笑录》呢？又似乎应该略略加以说明，既要说明，那便是序了。反正要写几句卷头语之类，我不如索性直唤它是“序”。

政治的内幕，太复杂而且太变幻了；仿佛夏天的天气，万里晴空，骄阳如火，你偶然见着天际横着一抹淡淡的微云，也许不大而且绝不经意，然而这一抹淡淡的微云，一阵便倏然变成了骤雨，一阵或者倏然变成了狂风。身当其事的人们，自己也难得知道它变幻的来源，也难得知道它演化的结果。要防患未然罢，本来似乎没有患；要补救事后罢，竟直使你来不及救，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身命也要听天由命的让其浮沉。在当时遇事时，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在今日我把笔纪载，事已隔了许多年，还是感觉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

我写这本纪载，是不希望读者当作正史读的。正史是什么？等于我们过了一天，拿铅笔在月份牌那个日子画一个符号。例如今日是一月一日过去了，就在一月一日那格上横一画，但一月一日之内所经过的事情太复杂而且太变幻了，那

横的一画丝毫也不能表示它的原因和结果！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成立，我知道将来正史是必会大书特书“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于广州”，但国民政府成立前所酝酿的种种喜剧，正史是不会记载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引出来的种种悲剧，正史也不会记载的。并且历史是人做的，人有时老老实实的在制造一段历史，也有时虚虚伪伪的会磨灭一段历史。历来正史的编年纪事不必谈，即自创业的皇帝以至于揭竿的英雄，关于他们的本身谁没有过奇异的传说？只是成则为王时候，那传说便变了神迹，败则为寇时候，那传说倒变了鬼话。就算是不值一谈的鬼话罢，有时也会被人磨灭得干干净净，一点不给它记上历史。

我不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正史看，难道我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小说读吗？那又不然，大凡小说多少总带点臆想，带点虚构，否则情节和词藻都太平凡，动不起读者文学上的兴味。可惜我这本书根本没有臆想，也没有虚构，情节是那么平淡无奇，词藻是那么单调乏味，它也没有文学的价值，它也不合小说的体裁，只好当作一种零碎史料，帮助读者于读正史时候，偶然“疑不能释”，拿它作翻案的张本。

什么是写这本书的动机呢？那是我完全为着打不平。我知道将来国民革命正史出版时，一定有许多事实被抹煞的，一定有许多朋友受冤枉的，我为着打不平，所以要写这本书，我固然唤它是《苦笑录》，但读者喜欢时也未尝不可以唤它是“洗冤录”。

为着从事政治十几年，境遇把我挫磨到一点棱角也没有了，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只是爱打不平的天性，无论政治怎样

把我压迫，始终没有毁灭，依然特立。我想大概为着遗传的关系罢，也许为着陶炼的关系罢！我为什么提起遗传呢？我父亲生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一流人，他为革命丢了他固有的地位不惋惜，他为革命花了他整个的家产不懊悔，我身上有了这种倔强血液的成分，自然带了只问心之所安不问事之成败的天性了。我为什么提起陶炼呢？我在少年时即在革命里翻筋斗，儿童时代便学会那驰马试剑，听惯了那任侠仗义，使得我后来成功了一个重然诺轻生死的一个傻子。

血统既有倔强的遗传，环境又有那奢遮的陶炼，所以我一生做事都爱犯困难和冒危险。难道我真爱困难和危险吗？绝不，只是我遇困难时，心想我今日真碰着困难了，如果我能够把困难克服，岂不极有趣味？我碰着危险也有同一的想像，假定危险终于跳不过，最险也不过是死，无缘无故而碰到死，你想天下事更有比它有趣味的么？

我自少很有爱好文学的倾向，我发梦也想不到会做政治家。我不但对于政治没有兴趣，而且素来就对于政治讨厌。满清时代的政治已够我讨厌了，民国时代的政治更够我讨厌了。大概也因遗传关系罢，终于命定了要我要走上政治的一条路。谁叫我生就打不平的天性呢？少年时候跟着父亲闹革命，自己何尝有见地，有主张，不过看见满洲人统治了中国，故而要打不平罢了。民十四由美回国，何尝想从事政治，只见国民党局促一隅，一般所谓老同志的，都避义如浼，袖手不顾，故而要打不平罢了。对于反蒋，我何尝想两次首先树起大旗来作急先锋，也是看见蒋先生阴鸷强悍，要硬碰硬的抢领袖，故而要打不平罢了。

除了打不平之外，写这本书也恐怕带几分浪漫的气息。我始终当人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做人有做人的责任，而做人也有做人的兴趣。我对于事是绝对负责的，但责任完成之后，我要保持我的性灵。远的不必说，就在实业部的当时，我办公比别人到得早，退值又比别人走得迟，但一离办公厅之后，把门一关，心想：“且让部长的公博先生暂时关在这里，我自己的公博先生要自由一下了。”因此，说实在话也是我的保持性灵，终不成因我从事过政治，便再不容许我说实在话？政治真是令人够受了，为着政治，有时你不能不说心内不愿意说的话；为着政治，你有时又不能不说心内十分愿意说的话。我扮要角，念戏词，真太久而且太多了，我今天不能不本着我的性灵，痛痛快快写些“求其心之所安”的实在经过。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算是说完了。我还想补一下白的，差不多在这本书里，谁都受过我的批评，读者不要说：“人人都不对，难道天下间只有你一个好人吗？”我绝不承认我比别人好，或者我承认我比别人更坏，不过既名实录，应该存真，我既不愿无聊的扬善，也不愿有意的隐恶，一笔一笔的纪实，并不是故意扬己而抑人；况且这本书或者在我死后才能出版，天下更无死了才找人晦气之理？

这本书虽然写好，我知道出版是无期的。政治上的内幕差不多完全给我揭穿了，我不愿意政治还因我这本书重复惹起轩然大波，我只有把这份草稿封锢起来，倘若我命长的话，等到书中人物有三分之二以上作古才付刊，倘若我命短的话，那读者或者可以比较的快些和这本书相见。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公博序于香港

卷头的预白

(一) 这本纪载是从民国十四年七月起，至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止。中间少不免还有大事漏了叙述，但凡我没有参加，或者不是亲自与闻的，恐怕犯了以耳为目的弊病，不敢强以不知为知，一概从略。至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中日战事发生后，更有许多大事，那我打算另写一本专书，在此也不枝节的再提。这本书写成以后，还有大事继续发生，是不是我还补述呢？我目前也没有这样计划。

(二) “盖棺论定”四个字是中国人臧否人物的忠恕之论。这本书是写成于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天，以后书中人物必定还有变化的，但我再不等他们去盖棺，我就以今日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他们若再有变化，有机会时只好另写一篇文章去叙述，我决定不再变更这本既成的纪载。

(三) 书中有两位先生我对他们是称先生而不名；一个是汪精卫先生，他是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又是国民政府的创业者，所以我常称他为先生而不名。一个是蒋介石先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领袖，也是统一中国的大功者，所以我也常称他为先生而不名。自然我对于他两位都难保无微词，尤其对于蒋先生不满，但我依然对他们表示尊敬。

(四) 中国人的名字最难记忆，他们有大名，也有别号，

往往有人知一个人的别号，而不知他的大名，也有人只知一个人的大名，竟直不知他的别号。书中有许多人物，我只唤他们别号，原因不是我故意谦抑的代他们讳名，而是我对他们太熟了，平时叫顺了口，提笔记载时，似乎叫他们大名，反而觉得太生硬。这本书出版一定距离写书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恐怕年代湮远，读者不一定知道某人别号就是某个大名，我所以不惮烦的照着笔画的顺序，编定一个名号表，至于我单写他们大名的，那就不再烦赘。以下是一个名号表：

王法勤号励斋	王宠惠号亮畴	孔 庚号雯轩
孔祥熙号庸之	古应芬号勳勤	白崇禧号健生
朱培德号益之	朱晖日号步云	朱家骅号骝先
伍朝枢号梯云	李济琛号任潮	李宗仁号德邻
李章达号南溟	李品仙号鹤龄	李 江号冠洋
李烈钧号协和	李福林号登同	李文范号君佩
李 铭号馥荪	何应钦号敬之	何 键号芸樵
狄 膺号君武	吴鼎昌号达铨	沈鸿烈号成章
林 森号子超	居 正号觉生	胡汉民号展堂
胡宗铎号今予	胡 瑛号经武	陈济棠号伯南
陈铭枢号真如	陈 诚号辞修	唐生智号孟潇
唐绍仪号少川	徐景唐号赓陶	徐永昌号次辰
徐 谦号季龙	孙 科号哲生	夏 威号煦苍
马超俊号星樵	陶 钧号子今	张人杰号静江
张 继号溥泉	张发奎号向华	张定璠号伯璇
张学良号汉卿	张 群号岳军	张治中号文伯
黄 实号蘅秋	黄 郛号膺白	黄绍竑号季宽

黄镇球号剑陵	邹 鲁号海滨	许崇智号汝为
冯玉祥号焕章	商 震号启予	鹿钟麟号瑞伯
郭泰祺号复初	傅汝霖号沐波	傅作义号宜生
程 潜号颂云	覃 振号理鸣	叶恭绰号誉虎
彭学沛号浩除	经亨颐号子渊	贾景德号毓儒
邓演达号择生	邓世增号益能	赵丕廉号芷青
熊式辉号天翼	刘文岛号尘苏	刘 兴号铁夫
刘 峙号经符	刘 骥号菊村	刘维炽号季生
鲁涤平号咏盒	蒋方震号百里	蒋光鼐号景然
薛 岳号伯陵	薛笃弼号子良	蔡廷锴号贤初
阎锡山号百川	谢 持号慧生	戴传贤号季陶
萧振瀛号仙阁	谭延闿号组安	罗文干号钧任
顾维钧号少川	龚 浩号孟希	

第一章

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夕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于十四年七月一日，现在虽然不列入于国家纪念日，而在政府方面每年都有照例的纪念，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似乎还没有四月南京政府成立那样深刻。倘使没有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自然也连带没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只是历史是人造成的，而有时历史也会被人抹煞的，现在人们似乎对于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的印象很模糊，其原因就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们极力想抹煞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那一段艰难缔造的历史。

在孙先生逝世之前，本已拟定成立国民政府的方案，无如当时大元帅所占的地方仅仅得一个广州市，在东江方面有陈炯明统属下的林虎和叶举军队，在南路方面又有陈炯明统属下的邓本殷军队，北江虽然有谭组安先生的湘军和朱益之先生的滇军，西江虽然有李任潮先生的第一师，可是都有些残破，力量未能充实。就是广州市罢，那时还有著名的杨刘军队，所谓杨刘军队就是云南杨希闵和广西刘震寰的队伍，他们自从由广西东下，便盘据着广州，把小小一个广州市划区防守，不过他们划区并非为着军事需要，而为着开烟和开赌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既在烟赌，对于大本营的命令是绝不服从

的，这样大本营还不能算健全，怎样可以改建国民政府？

说至此地，我可以回述我个人回国的经过了。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廿九抵美国的纽约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整整研究了两年，于十四年二月八日离开纽约取道欧洲回国。当时虽然把博士必修的课程学完，但实在没有一点动机要东归，有之就是经济发生了奇窘。我在哥伦比亚时候，廖仲恺先生恰恰做了广东省长，我还算是一个广东官费留学生，只是两年没有领到一文的官费。我恃着曾和廖先生同过事，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的广东省教育会，大家同为评议员，因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继续汇款给我，同时还给汪先生和陈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们替我说几句话。不久我接秋霖的来函，说汪廖两先生都有同一主张，即是我若答应回国，他们会给我筹旅费，若继续求学，那么他们便不负责任。那时我真进退两难，结果只好决心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从广州汇来美金六百元，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算是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我既有了旅费，遂定于二月八日离开纽约往伦敦，经过柏林、巴黎，而抵罗马时，知道孙先生已在北京逝世。我原想更往东欧一游，至是恐怕广东又有变动，只好将原来计划变更，就在义大利的纳波里登船，直航归国。

我到广东的时候，已是四月中旬，那时汪先生随孙先生北上，孙先生逝世之后，他病在上海未归。而廖先生则因东江初平（那时蒋介石先生已带黄埔军队占领潮汕，是为第一次东江之役），也往了潮汕，只有胡展堂先生以省长资格（那时他接了

廖先生省长之任)兼代大元帅职务,留守广州。我和胡先生是不大熟悉的,因是我只往广东大学找邹海滨先生接了一次头,在家整理和预备下一年度的功课。

不久汪廖两先生都回到广州了,他们告诉我大本营是不能号召的,必得要改组国民政府,不过国民政府成立的先决条件必得将杨刘两军队救平,否则不独政府命令不能出国门,恐怕还不能出府门,这样虽然把大本营改组了国民政府,也恐于事实无益。

那时国民党的兵力太弱了,要夺回广州市,势必放弃东江,但两利相权取其重,只有命令蒋先生回师会同湘滇两军来消灭杨刘军队。杨刘在广州也实在太胡闹,除烟赌之外,什么也不管,广州差不多每一条大街都有烟赌,他们的军队就是烟赌馆的卫兵,官长则淫乱骄奢,士兵则荒纵横悍;这样的军队不除,国民政府真无从成立,国民革命也无从谈起。

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广州,我回国头一次再会见他,还是黄居素代我约时间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见他,那是九时左右罢,我看他客厅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楼,见了各人打一招呼,对我说:“公博,你回来了吗?很好,我们改日再谈罢。”那时各人一哄而起,包围着他,言语嘈杂,他似乎无暇应付,敷衍了几句,也不知是说什么,便坐上汽车走了。我想仲恺怎么忙到这样,约了人而无暇谈话,这太越乎事理,在外国住惯了的留学生,实在有些看不惯,我告诉居素说:“我们走罢,我实在看不起这种乱局面。”

过了两日廖先生派人送信来,说约我夜里见面,那夜我们毕竟面对面的谈了很久。这一席话遂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命

运，我真想不到我会从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来对于政治冷淡的人 would 从事政治。

“公博，你回来了，你打算怎样？”廖先生问。

“我没打算，我还是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没有出国之前就在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所以我还是打算教书。”我说。而且我当时对于教授很感觉兴趣，对于广州的政治实在看得太不顺眼。

“那是你的打算了，不过这并非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希望你回国，不是教书，而是帮我们的忙。”廖先生这时对我有点失望，但依旧带着希望的神气。

“不过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我还肯定的说。

“我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我一定要和你辩论，你看中国这样落后，政治那样腐败，要不要想办法？”

“自然要想办法。”

“既要想办法，要不要组织？”

“自然非有组织不行。”

“你看国民党有没有希望？”

这一问太难倒我了。平心而论，当时国民党虽然说已改组，但离所谓“组织性”还远。我只有说：

“恕我大胆批评，国民党还没有组织严密。”

“你的批评很不错，但你还有大错，即是只会冷静的批评，而不肯努力的参加工作。这样，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永远不能实现。”那时廖先生已把握着我的辩论弱点，直接采取攻击的姿势。

“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样呢？”我心坎中的火焰已给他燃烧